

# Primitivism and Poetic Urban Inhabitation: The Redemption of Humanity in Lawrence's Works

WANG Tingting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9, 2022

Accepted: February 12, 2022

Published: March 31,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Tingting. (2022). Primitivism and Poetic Urban Inhabitation: The Redemption of Humanity in Lawrence's Work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63–16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18](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18)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18>

**Abstrac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true nature of human has become highly salien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exploration of which constitutes a central theme in D. H. Lawrence's works. Centering on the four novels of Lawrence, this paper studies Lawrence's exploration of the redemption of humanity in a highly industrialized society. Lawrence resorts to an approach of primitivism, including primitive sex, the restoration of primitive virtues and qualiti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ose intimacy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firstly. Secondly, Lawrence looks into the emotional bonding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cities, testing the likelihood of poetic urban inhabitation through urban roaming.

**Keywords:** alienation; primitivism; urban inhabitation; Lawrenc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ANG Tingting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gender studies and moder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95220401@qq.com.

## 原始主義與城市棲居：勞倫斯作品中人性的救贖

王婷婷

淮南師範學院

**摘要：**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與人的自然本性之間的衝突成為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社會的一個尖銳矛盾，對於這種矛盾的探討是勞倫斯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該文以勞倫斯的多部小說構成的複合文本為研究物件，剖析勞倫斯對工業化社會中人性救贖途徑的探索：勞倫斯首先訴諸於原始主義的途徑，他的作品表現了通過原始的性愛、原始的美德和品質的復歸以及重建人與動物最原初的親密關係來救贖人性的嘗試；其次，他在作品中發掘與城市建立情感聯繫的可能性，尋求



通過城市漫遊達到詩意地棲居於城市的可行性。

**關鍵詞：**異化；原始主義；城市棲居；勞倫斯

## 引言

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以高度的機械化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壓抑扭曲了人性，文明與人的自然本性之間的衝突成為當時西方社會一個尖銳的矛盾。對於這種矛盾的探討也成為英國著名作家大衛·赫伯特·勞倫斯(D. H. Lawrence)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在勞倫斯看來，高度機械化的現代文明試圖慫恿人們相信，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具有的多重身份，如物質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政黨或民族國家的成員、越來越強大的機器的操縱者，可以保證他們找到滿足感以及歸屬感，世上並不存在外在於他們並且大於他們的非人類力量。這種盲目的自負無非是自欺欺人，這種思維只能導致人與社會或其自然本性分離、疏遠及異化。勞倫斯對現代工業主義以及工業文明的批判並非首創，這種批判可以納入反對工業主義的文學傳統中去。對工業主義的抗議與反對在19世紀的英國文學中佔據了重要地位，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辨認出勞倫斯沿襲的反對工業主義的前輩作家，如柯勒律治、狄更斯、卡萊爾、羅斯金、馬修·阿諾德和威廉·莫里斯。對於他們來說，機器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的機械化，使得人們鑽營於算計和佔有，使人性的光輝和個性變得貧乏，社區精神遭到破壞，人們也失去了一些最有價值的民族傳統<sup>①</sup>。作為英國現代主義作家的傑出代表，勞倫斯在沿襲傳統的基礎上，在其文學作品中積極探求應對機械文明造成的人性異化的解決之道，與此同時，他的探索也呈現出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獨有的特點。

## 一、訴諸原始主義

勞倫斯首先試圖在作品中探討從原始主義中尋找答案的可能性。「現代主義的一個主要的矛盾之處在於：當下最完滿的成就在於向著古代的回歸，或者是對古代的重新評價。」<sup>②</sup>「原始狀態的人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與宇宙的關聯方式也與我們不同。」<sup>③</sup>對於原始主義的回歸在勞倫斯的作品中呈現了三種主要形式：首先是原始的性愛；其次是個體對原始的美德和品質的複歸；再次是人與動物最原初的親密關係。

### (一) 原始的性愛

《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以英國中部偏北的一個煤區為背景，描繪了柯利弗德·查特萊爵士的太太康妮與她家的獵場看守人梅勒斯之間的兩性關係。「柯利弗德的殘廢象徵著……一種深沉的心理和情感上的癱瘓。」<sup>④</sup>「而康妮與梅勒斯之間完美和諧的兩性關係則象徵著生命的復蘇和人性的回歸。他們的性愛不僅代表了一種巨大的再生力量，也是作者為死氣沉沉的英國社會找到的一條起死回生的出路……在這部以性愛為題材的小說中，寫實與抒情、原始主義與浪漫主義、自然主義與象徵主義爭妍鬥奇卻又彼此交融。」<sup>⑤</sup>然而依靠原始的性愛來應對個體所感到的異化並非萬能鑰匙，《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的結尾處，康妮和梅勒斯都在等待著，他們之間關係的最終走向也懸而未決，這本身就是一種具有開放性的結局，也表明了作家勞倫斯本人對於原始性愛作為解決機械化的工業生產帶來的異化的途徑的猶豫不決和彷徨。此外，這種對越軌的男女性愛的描寫必然地指向了倫理困境，康妮和梅勒斯的結合必然受到千夫所指，被大眾鄙視。正如鐘鳴在其文中指出的那樣，勞倫斯所強調的「血和肉」彰顯的人性中蘊藏的獸性與動物的本能，對於張揚獸性的性行為的大肆宣揚抑或是大加讚美，正是勞倫斯作品中的糟粕，應該否定、批判。<sup>⑥</sup>

## (二) 原始美德和品質的複歸

《英格蘭,我的英格蘭》是勞倫斯著名的短篇小說,該短篇小說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在田園詩般的鄉村環境中審視現代性與英國傳統的民族特徵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男主人公艾格伯特和女主人公維尼弗雷德結婚後的感情與日俱增,他們定居在維尼弗雷德的父親給予他們的風景如畫的農舍裡。即使他們有了孩子,艾格伯特仍然拒絕接觸社會,他將自己隔離在農舍的花園和周邊的自然環境中。艾格伯特夫妻在經濟上不得不依賴維尼弗雷德的父親,夫婦之間的裂痕變得越來越深。他們的大女兒腿部受傷,因為未能得到有效的醫治,不幸夭折。後來戰爭爆發,艾格伯特入伍,而後在戰爭中遇難。艾格伯特逃避現實,失去了女兒和自己的生命,但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這種悲劇屬於英國整個社會,勞倫斯對此予以精確地捕捉和定位,並在《英格蘭,我的英格蘭》中忠實地反映了整個社會衰落的精神風貌。

在《勞倫斯中短篇小說選》中文譯本前言中,譯者將《英格蘭,我的英格蘭》中的夫婦解讀為代表著英格蘭民族中的兩種文化特質:務實的苦行精神與空靈虛幻的審美精神。小說似乎在暗示英格蘭在近現代過於偏重務實和物質,輕精神和審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民族性格的分裂與墮落,其結果就是幻滅和毀滅。<sup>⑦</sup>而筆者更傾向於將夫婦二人理解成處於不同時代的人。在詹明信(Jameson)看來,現代主義最明顯的特徵在於文化層面的現代性發展的不均衡(uneven modernity)。<sup>⑧</sup>這種不均衡性可以體現在快速發展的社會和民眾所堅持的傳統的價值和信仰的間隙之上。妻子在孩子出生以後就感到對孩子應盡的義務,要照顧好孩子,她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倫理身份,她是活在現代的,也象徵著現代社會的瑣碎和碎片化。丈夫卻「忽視這個世界……他愛過去的時光,愛古英格蘭的音樂、舞蹈和習俗,他試圖靠這樣的精神過活,而不是以金錢世界的方式生活。」<sup>⑨</sup>我們可以把丈夫的行為理解成個體通過對原始的美德和品質的複歸來對抗現代社會帶來的疏離感。文中反復出現的「不是時候,不是時候啊」也佐證了夫妻所處的不同時代。他們彼此深愛,但是也彌合不了他們之間的時代差距。脫離時代追求原始主義的做法顯然也是有局限的。當女兒的腿骨被刀割傷後,丈夫尋找的是和原始主義相連的赤腳醫生,而不是現代的X光,結果貽誤了病情,導致了孩子的死亡,該小說從而也揭示了對原始美德和品質的回歸顯然也是行不通的。

## (三) 人與動物最原初的親密關係

中篇小說《烈馬聖莫爾》中,年輕的女主人公露(Lou)家境殷實,她小小年紀就可以到國外求學。她不停地四處旅居、遊學,作者借此表現了工業社會發展給都市人帶來的無根、漂泊的心態。她的丈夫瑞克(Rico)是個性別模糊的人。婚後不久,夫妻二人心照不宣地將婚姻關係維持在了柏拉圖式的精神層面上。露偶遇了一匹與眾不同的洋溢著野性的名叫聖莫爾的烈馬,它的原始的奔放和現代社會中生存的人與動物的馴化和孱弱形成鮮明的對比。它的安靜的外表下面散發著緊張和警惕的氣息,讓人可以感知到它潛在的威脅性。「露意識到聖莫爾所呼吸的空氣和瑞克以及我們的世界的空氣是不一樣的。也許那些古老的希臘的駿馬才能和聖莫爾馳騁在同一個世界中。」<sup>⑩</sup>聖莫爾不屬於瑞克,所以當瑞克試圖駕馭聖莫爾時,他立刻就被摔下來。唯一能和聖莫爾相匹配的只有馬夫路易斯。路易斯是凱爾特人後裔,他「如同動物一樣」,<sup>⑪</sup>當威特太太給他梳理頭髮時,他會「悄無聲息地轉頭探視,就像一個落入圈套的動物一般。」<sup>⑫</sup>他保持著和自然的親密聯繫,他說:「如果你砍樹時沒有給大樹道歉,大樹遲早會傷害你的。」<sup>⑬</sup>和瑞克相比,路易斯洋溢著粗野的動物般的活力。「對於勞倫斯來說,從現代社會的工業化生產和精神及肉體的萎靡中逃離的唯一途徑就在於重新接觸到生命的活力物質,就如人與獸最原始的聯盟那樣……那種人與非人的動物的最原始的高貴品性的共生。」<sup>⑭</sup>《烈馬聖莫爾》中,露對聖莫爾原始本性的感知,路易斯和聖莫爾的惺惺相惜的親昵關係彰顯了人與動物的高貴的共生以及交流。然而,人與動物最原初的交流的探索也是不成功的,當露再次和聖莫爾相



遇時，聖莫爾已經被馴化了，喪失了原有的野性，成為了尋常的、服服帖帖的被工業社會馴服的馬匹。

## 二、漫遊於城市：城市的再棲居

勞倫斯的第二種探索在於棲居於象徵著荒原的城市。在狄更斯、辛克萊、艾略特等作家的筆下，城市或城鎮在一定程度上與人性的異化、精神危機相聯繫，成為了荒原的代名詞。

如果「無論城市是好是壞，它都是我們的未來」<sup>15</sup>這句話是真的，那麼對於進行創作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以及進行城市設計和規劃的專業人士來說，城市的重新棲居就變得愈發重要了。在此過程中，「真正的考驗是我們通過個人的和共同的能力，去發掘內心的表達、經驗和感知，以此來共同構建我們對地方的認知圖景。」<sup>16</sup>這個過程要求我們重新想像城市化、工業化對自然景觀的改造，以及我們對物理、實體的環境的持久性的再認識。現代化和城市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如果暫時找不到從本質上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麼人們只好接受悲慘的命運，想出方法與身處的荒原建立情感聯繫。

勞倫斯的《白孔雀》創作始於 1906 年，歷經三次重大修改，最終於 1911 年出版。小說出版後，許多評論者即刻察覺了小說作者獨特的視角和寫作才能。小說對工業化給鄉村生活造成的異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勞倫斯將《白孔雀》的情節置於英國鄉村納塞梅雷。納塞梅雷與 20 世紀二十年代美國中西部興起的「反鄉村敘事」文類中的鄉村有著相通之處。「反鄉村敘事」的主要特點在於揭露長期以來理想化的鄉村田園書寫的不切實際。在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影響下，美國鄉村並不是完全美好的，而是隱藏著諸多陰暗面，比如村民情感的壓抑，以及鄉村共同體對村民的強制性的同質化要求。<sup>17</sup>鄉村共同體不提倡內心真實情感的宣洩，不能容忍出格的行為，村民的行為、言論必須和大眾保持一致，稍有出格就會受到權力的監視和懲戒。勞倫斯筆下的《白孔雀》中的鄉村同美國「反鄉村敘事」中的鄉村一樣，絕非田園詩般的烏托邦。雖然納塞梅雷山谷景色怡人，如詩如畫，但是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山谷逐漸被濃煙滾滾、井架林立的礦山所包圍，山谷的寧靜也被機器的轟鳴和喧囂所侵擾，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反田園、反鄉村的特徵。

小說講述了敘述者希利爾視角下的一對青年男女之間情感的變化和發展。在納塞梅雷山谷中，農家小夥喬治如同自然之子一般，面貌英俊、身體強健，他和鄉紳的女兒（敘述者希利爾的妹妹）賴蒂之間逐漸產生了愛慕之情。此時的 valleys 已經受到了煤礦、工業化以及消費文化的影響。受現代化影響的賴蒂沒能全心全意地接受喬治的愛情，賴蒂覺得優越的生活不等於天真的愛情，最終選擇了優裕舒適卻缺乏愛情的婚姻，嫁給了頭腦簡單、精神空虛、象徵著工業化生產的煤礦主洛茨理。可悲的是，賴蒂和洛茨理結婚之前，洛茨理遭遇了事故，影響了生育能力；喬治在賴蒂拋棄他以後，悲痛絕望，與一位他並不愛戀的鄉村姑娘結婚，婚後在小鎮上經營一家酒館，並借酒澆愁，從此消沉下去。由於煤礦的侵入，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將離開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山谷，搬到小鎮或城市居住。小說看似以完全的絕望結尾，但是敘述者希利爾在大都市倫敦的漫遊經歷為小說增添了一抹希望的亮色，讓讀者看到城市再棲居的希望。

由於工業化的擴張，男主人公希利爾也要離開鄉村納塞梅雷，前往倫敦生活。布伊爾（Buell）指出環境決定論會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人的能動性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決定論的影響。在荒涼和壓抑的城市中生存的人們也不一定會感到疏離和無根的苦痛。通過在城市的漫遊，人們可以逐漸建立和城市親密的關係。在城市的生活也可以產生快樂。德萊塞記得芝加哥是「老鼠之城」，但是他沒有回憶那貧窮和被束縛的苦痛，而是把在貧民窟生活的童年記憶變成了湯姆·索亞般的美好時光，他甜美地回憶著把打老鼠當作遊戲的快樂。<sup>18</sup>起初，希利爾在倫敦的生活是痛苦的，「我在諾伍德劇烈地飽嘗思鄉之苦。」<sup>19</sup>然而隨著他在城市徘徊和漫步的深入，他漸漸地和這座城市熟絡起來，並且把故土納塞梅雷的記憶投射到城市中，把城市與故土聯繫起來，逐漸在城市中找到樂趣，並且喜歡上了這座城市。「明晃晃的車燈在倫敦大橋車站的車棚裡鑽進鑽

出,就像亮晶晶、圓圓的蜜蜂從烏黑的蜂房裡飛進飛出;郊區的街燈隱在樹枝中,閃耀著檸檬色的光環。我開始愛上這個城鎮了。」<sup>①</sup>「清晨,我喜歡漫無目的地在街上的人流中悠閒地轉轉,注意觀察每張走近我的面龐,猛地抬起烏黑的眼睛瞥一眼,看從我身邊擦肩而過的女人們說著話的小嘴就像盛開的花朵,看男人們的肩胛在外套底下微妙地聳動以及他們裸露的脖頸,一路閃著溫和的白光,沿街遠去。我非常喜歡城市裡男男女女的流動,他們柔韌、迷人的肢體在川流不息,以及他們走近時,突然投過來的目光和嘴唇的抽動。我的目光在大街上眾多的面孔上搜尋,就像一隻蜜蜂醉醺醺地在藍色的花叢中搜尋。我沉醉於那奇異芳醇的花蜜,那是我從行人的眼神中吮吸出來的蜜汁」。<sup>②</sup>對於希利爾而言,在城市中漫遊的經歷是重新感知、認識和發現城市的過程,他將城市空間中的人造物體比作有生命力的生命體,或者關注城市中流動的人群並將其美化成自然環境中的鮮花,將在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相遇比作是蜜蜂與鮮花的親昵。勞倫斯如同布萊克、華茲華斯和來自美國的詩人惠特曼一樣,他們在工業化造成的城市荒原中,努力通過詩意的想像將大都市轉化為鮮活的、有血有肉的有機體,使得城市變為適宜棲居的美好的居所。

## 結語

19、20 世紀之交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年代,充斥著信念的失落、正確價值觀的缺失、戰爭的暴力和莫名的焦慮。在此背景下發生的現代主義這場內涵豐富的運動中,文學承擔了哲學重負,參與到尋求真實的宏圖偉志當中。<sup>③</sup>勞倫斯和廣大的 20 世紀初的藝術先驅們一樣,相信文學作品不僅能夠證明作者的價值而且也能有益於文化,他忠誠於這一崇高信念,<sup>④⑤</sup>用自己的作品為人性的危機探索救贖之道。<sup>⑥</sup>勞倫斯在作品中的嘗試包含朝向原始主義的回歸和城市再棲居。雖然原始主義的路徑在工業化進程中看似行不通,但是城市再棲居還是為處於工業化的異化威脅中的人們提供了一絲希望。在勞倫斯的時代,如果工業化、城市化的趨勢勢不可擋,那麼人們就必須重新思考人與城市的關係。城市再棲居強調以嶄新的視角感知城市,通過想像、回憶等途徑與看似冰冷的城市的自然與人造的景觀建立情感的聯繫,瞭解城市的歷史和過去,參與到城市未來的規劃和設計,融入到城市共同體當中。

## 注釋

- ① Jacobson, D. (1967). D. H. Lawrence and modern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 81–92.
- ②③ Levenson, M. (200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④ Buckley, W. K. (1993). *Lady Chatterley's lover: loss and hope*.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 ⑤ 李維屏:《勞倫斯的現代主義視野》,《外國文學研究》2008 年第 4 期,頁 49。
- ⑥ 鐘鳴:《人性因數與獸性因數的鬥爭與轉換——〈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的文學倫理學解讀》,《外國文學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78。
- ⑦⑧ [英]勞倫斯著,畢冰賓譯:《勞倫斯中短篇小說選》,濰江出版社 2012 年版,頁 6、143。
- ⑧ Kalaidjian, W. (2006).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⑩⑪⑫⑬ Lawrence, D. H. (1925). *St Mawr; together with the Princess*. London: Martin Secker.
- ⑭ Armstrong, P. (2008). *What animals mean in the fiction of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⑮ Lehan, R. (1998).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⑯ McGinnis, M. V. (1999). Boundary creatures and bounded spaces. In McGinnis (Ed.), *Bio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⑰ Hilfer, A. C. (1969). *The revolt from the village, 1915–193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⑱ Buell, L. (2001).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Harvar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⑲⑳㉑ [英]勞倫斯著, 教莉譯:《白孔雀》, 山東文藝出版社 2010 年版, 頁 260-264。
- ㉒㉓ Levenson, M. (200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㉔ ZHANG Pengxia. (2021). Materials and symbols: the primitive cultural form of visual ar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 113-117.
- ㉕ NG Woonlam. (2021). Dynamic chang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concepts and its simplification in 3D animation spac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3), 48-56.

(Editor: JIANG Qing)